

白天当气晚上看戏的大会

白天当气晚上看戏的大会

中共党史小丛书

陈雪薇 李向前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小丛书 ·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大会

——七千人大会始末

陈雪薇 李向前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大会/陈雪薇等著·一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
(中共党史小丛书)
ISBN 7-205-03752-2

I. 白… II. 陈…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D32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86 000 印张：5 $\frac{5}{8}$

印数：1—6 000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杨永富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吴广军

定价：7.00元

总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大概可以说是人们对历史科学作用和定义的一句最浅显而生动的概括。镜子是多种多样的，从远古的水面光影，到出现专门的铜镜，到现代的各式镜子，以至镜子的变种和延伸：望远镜、显微镜、天体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等等。镜子的形象、功率、效能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功能却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观察自己、观察社会、观察自然，是开阔眼界的重要工具。

历史学的这种意义和功用，我们的祖先就早已懂得。唐太宗李世民在痛悼宰相魏徵时说的那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从三个方面讲了镜子的作用，而其中的第二点是直接讲历史的，以古为镜就是以史为镜。李

世民是通过历史去研究历代王朝的兴替，用以总结经验教训，巩固李家王朝。但我们如果扩而广之，也可以把“兴替”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科学的根本要求。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人类自己的社会实践去探索它、总结它，逐步认识和掌握它。人类过去的社会实践就是历史。从这个角度说，研究历史，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惟一途径，除此绝无他途。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评述国民党时说的一句有普遍哲学意义的话：“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

正像镜子多种多样一样，历史学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多学习一点历史，既学一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又学一点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时间和条件不够，只能择其要者先读之，那么学一点什么好呢？我十分赞成毛泽东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看法。他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3～1124页。

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① 五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学的研究有进展，状况同当年相比，自然是好了许多。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还不能够说，真正懂得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的人已经很多了。

为什么毛泽东在提倡学习历史时强调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重要”呢？这是由中共党史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日益结合的历史；又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无数艰难曲折而夺取一系列的胜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所以，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已经成为新中国广大公民的愿望和要求。

学习党史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编写一套小丛书，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采取一事一册的办法，每册十万多字左右，同时努力增强其可读性。这样既可避免某些教科书式的简单、抽象，又可克服某些报告文学为追求生动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8页。

任意主观编造史实的缺欠，使科学性、准确性和可读性统一起来。我们认为编写这样的一套党史小丛书，不失为一种适合于普及党史学习和宣传的好方法，特别是对青年人进行党史教育的好方法。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共产党历史小丛书。全书有总的计划，大体上涵盖了党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但每一册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在出版方面也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成熟一册出版一册。这批小丛书的作者都是专业党史工作者，对所写作的专题都有相当的研究，但写这类通俗性的小丛书，则大都缺乏经验。因此，难免有各种缺欠，欢迎批评指正。

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已被提到全党和全国的重要议程。只有尽快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使两手都硬起来，才能保证我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前进。而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学习和宣传，则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它的功用是任何其他学科都不能替代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可以知来。愿这套小丛书能够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潮中的一滴水，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金春明

1996年9月25日 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一、特大会议的特殊背景	3
盲目跃进，陷入困境	4
被迫调整，步履维艰	14
二、高潮迭起的会议进程	30
盛会召开，不拘一格	31
深入讨论，推向高潮	42
“群贤毕至”，短兵相接	55
直言得失，又起新潮	72
三、大会重要的思想成果	90
以马克思主义态度，正确认识形势、 困难和错误	93
坚持实事求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建	

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112
没有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就不能 建设社会主义	127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134
四、会议的功过自有评说	152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个规模特大，内容又很特殊的会议，这就是 1962 年初，在国内国际的特殊背景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来自基层的县委书记、重要厂矿负责人以及地委、省委、中央局直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共为 7 096 人。这次大会参加人数之多，空前绝后，因而有“七千人大会”之称。所谓内容特殊，可以由毛泽东对这个大会特点的两句话作为概括：“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为什么需要边“出气”，边“看戏”呢？中央要求这次特大会议，真正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为了充分“出气”，配之以“看戏”，从而使会议做到严肃、紧张与团结、活泼

相统一，达到会议的预定目的。这确实是党的历史上所少有的。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将根据确凿的史料探讨和介绍这次大会召开的缘由、历史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特大会议的特殊背景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认识。这是我们见到的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早文件。但事实上，为纠正“大跃进”运动，特别是1960年以后在工作中的错误，中央已先后开过数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大多是有成效的，但未能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并使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充分贯彻落实，而国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政治、思想、文化及对

外关系的政策也有待进行调整。因此，召开一次有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是必要的。当时最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统一全党思想，更好地解决国内工作的问题。

为了详细地说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始末，还是让我们首先对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作一个较为详细的追溯和分析。

盲目跃进，陷入困境

1958年在我国出现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牵动、影响随后20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人们头脑突然发热的产物，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近百年来积弱积贫的惨痛历史，中国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斗争，始终是一切爱国者胸中久久萦绕不去的进取动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主席有一句话，特别能激励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那就是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可以想象，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中国人民会以怎样的热情和干劲，去

面对自己的事业。

当时，还有几件事情成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出乎意料的速度顺利完成了。原来计划经过 1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实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只用三年多便在锣鼓声中宣告完成了。同时，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因批判所谓的“小脚女人走路”，而加快实现了。这种超过预计的“全面加快”，自然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以为一切其他任务也都可以这样计日功成。

其次，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尽管在今天看来，是严重的扩大化了。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它反掉了“动摇分子”，反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用冲决一切阻碍的速度迅猛发展。

再次，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十分有利和蓬勃发展的高潮。日内瓦国际和平会议后，世界局势明显趋向缓和，而朝鲜战争和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则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在同社会主义的抗衡中，开始走下坡路。因此，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高涨的气氛。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宣

布，苏联将于 15 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毛泽东亦于 11 月 18 日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胆设想：在 15 年后，中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大胆设想于 12 月 2 日由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予以宣布。它震动了世界，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特别高昂的斗志。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国际和国内社会背景看，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确实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因缘的。中国人要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没有错，而以前人所没有的速度实现这个理想，也完全是应该的。于是，“大跃进”运动兴起了。然而，这个包含着几亿中国人主观愿望和理想的运动，却出人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遭到严重挫折。这个不可更改的现实，在中国人面前造成了一个两难的困惑：以超快的速度、以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去实现“自立民族之林”的伟大目标，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在实行起来，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混乱，使这种“超常”的局面难以继，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方法不对头，还是根本路线错了？是“一个指头”的毛病，还是“九个指头”都应该否定？

当然，要当时的人们承认，整个“大跃进”的战略方

针错了，是不容易，也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有那么多的“应该”在促使着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对一个造成几乎是全局性错误的原因，只进行“方法”上的分析，又似乎远远不够。因为，当人们对“方法”做进一步的考察时，就会触动“指导思想”这一层次上的问题。而“指导思想”，即意味着“战略”和“路线”。于是，人们便在这种“方法”或“路线”孰是孰非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可以说，自“大跃进”运动兴起并遭到挫折之后，这种分歧一直伴随着我们党前进的过程。它的“余音”一直延续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更远一点的历史时期，成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一个重大矛盾的“网结”。

1959年夏秋之交的庐山会议，使原本纠“左”、纠乱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在九十月间举国一片“反右”的浪潮中，“跃进”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于是从1959年底至1960年下半年，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跃进”高潮。其中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人民日报》1960年1月2日发表的著名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社论要求，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195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但要做到产量红，而且同时做到

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面跃进。人们知道，这里的“红”，是针对庐山会议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黑”而言的。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对大跃进“泼冷水”，散布“怀疑主义”，企图“阻止”人民跃进的步伐。同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呈现紧张状态。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对我国的大跃进颇有微词。至1960年中，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所需的重要设备，对我们施行经济压迫。这样一种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结合，造成了全党全国人民更从政治上看待跃进成败以及重要性的激动情绪，而忽略了经济上的承担限度与已经相当困难的生产局面。

1960年1月7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计划草案，钢的指标仍确定为1840万吨。这个数字比1958年全国拼尽全力才完成的1070万吨钢（其中许多是不能用的“土钢”、“废钢”）增加了700多万吨。4月，中央又同意并批转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三本帐的计划。所谓“几本帐”的做法，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即在公开制定的产量指标上面，再层层加码，以作为“争取达到”和“预期达到”的“底数”。这种“层层加码”的帐，后来实际上都成为了“必成”的数量指标，因此更加大了“跃进”中“狂想”的成分。1960年冶金部提出的钢